



献身於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几个高級知識分子的入党感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5

献身于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

——几个高級知識分子的入党感想

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几个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感想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5/16 字數 2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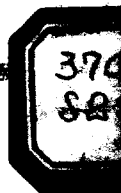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90,000

統一書号：3074·101

定 价：(5) 0.10 元



目 錄

我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党·····	刘仙洲(1)
我要为實現偉大的共產主义理想貢獻一切·····	歐陽予倩(7)
終身难忘的日子·····	黃家駟(11)
献身于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	唐 弢(17)
决心为党的事業献出我的一切·····	刘佛年(22)
最幸福最光荣的日子·····	周小燕(27)
为党的事業献出自己的一切·····	沈霽春(31)
为共產主义事業奋斗的新的开始·····	李國豪(34)
做一名向科学進軍的先鋒战士·····	沈岳瑞(38)

我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党

刘仙洲

我今年已經 65 歲了。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自从 1918 年大學畢業以后，一直在工程教育界服务，到現在已經有 37 年的歷史。这中間除在北洋大学担任过 4 年的行政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教書，僅在清華大学就教了 20 年。直到 1952 年，才又担任学校行政工作。

在 20 多年以前，我也曾有过“教育救國”和“工業救國”的幻想；但是，事实証明，不能实现，使我非常灰心。所以在解放以前，有相当長的一段时期，我是不問政治的，甚至連任何行政工作都不願意担任。在 1947 年，我 57 歲的时候，自己还这样盤算过，也公开向朋友講过：“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頂多再教 10 年書，再寫 5 本書，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責任了！”那时，我認为業務和政治是可以分开的。我認为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有少数特別聪明的人，对于搞政治和搞學問可能都好；但是有的就宜于搞政治不宜于搞學問，有的就宜于搞學問不宜于搞政治，如果弄得不得当，就会成績很差，甚至毫無成就。我当时主要的目的就只是想說明：“宜于搞學問的人最好不参加政治！”

解放以后，由于在各方面受到了党的教育，我的思想逐漸

有了轉變。

解放后的第一年，即1949年，我参加了当时農業部关于水車問題的座談会。部里提出要在1950年推廣10万輛水車，为華北人民解决春旱問題。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偉大。1950年初，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的議題是全省河防水利問題和生產救灾問題。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害的問題，都是过去自己常常夢想，但是当时反动政府决不肯花力量去做的。这使我明确地認識到：中國共產党所領導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質上的不同，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計劃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國共產党有了很高的信仰。

1952年春季，学校進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大家把我过去“只重視个人的事業（如學教書、寫書），对人民的事業不够热心”的缺点作了徹底的批判，使我开始認識到自己过去的不正确的思想，衷心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后来，在全系总结会上，我表示了态度：“……我虽說是老了一些，但是我决心要一步不停地向着共產主义迈进！”

1953年3月5日，人类偉大的導師斯大林逝世了，在得到确实消息的时候，我們正在学校的大礼堂开教学研究會，当时竟使我难过的落了泪，从內心里感到异常的悲痛。一轉念間，便產生了决心加入共產党的情緒，覺得我应当加入这样一个为全人类謀幸福的隊伍，把我所余下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共產主义事業——人类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業。

但是，自己經常也感觉到自己过去的旧習慣、旧思想还没

有完全去尽，怕不够共產黨員的条件。后来，一方面經常参加政治理論学习，一方面又不断地旁听党課，政治觉悟繼續有些提高，更覺着：我的旧習慣、旧思想殘余，如果在党的組織生活里边，由同志们多帮助我，一定会改得快一些。直到1954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那一天，一年以前的情緒又行發生，所以就毅然決然地向学校党委会提出申請入党。

后来，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之下，一方面繼續加强政治理論学习，一方面親身在校內、校外参加实际工作，使我对自已思想上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对待業務和政治的关系这个問題上，由于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的体会，使我認識到任何業務不但不能脱离政治，而且必須由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指導才能搞好。拿学校的工作來說，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不僅是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就是任何單位的行政工作，都必須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好，才能有比較好的成績。清華大学的教学改革工作所以能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穩步前進，都是同党的正确領導和大多数教师政治觉悟的提高分不开的。所以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于我們任何人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它不是过去我們一般所說的政治，它是指導我們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普遍真理。因此，無論是研究學問也好，進行工作也好，都決不能脱离政治。这样就把我过去多年对于業務和政治的关系的錯誤看法徹底糾正了。

在对于“民主自由”这个問題上，过去自己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1950年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

时候，河北省工会向大会献了一面大旗，上面寫着“巩固人民民主專政”8个字。这本來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的政治思想水平还很差，所以就想：只用“巩固人民民主”多好，何必要“專政”两个字呢？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認為任何“專政”都是不大好的。記得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林紓曾給蔡元培寫过一封信，責备他不應該放任一部分教师提倡白話文和新思想。蔡元培回信的大意說：他为北京大学延聘教师是采“兼容并包”主义，就是說，只要教师对于所担任的課程能够勝任就行，不管他抱着什么思想。思想很新的，如陈独秀等，他固然容許他們在校；思想很旧的，如辜鴻銘（当时还留着小辮子，主張宣統复辟，贊成妇女纏足），他也允許他在校。他这种說法，当时得到不少教育界人士的贊成。我当时也是贊成者之一。在解放以后的几年当中，我对“民主自由”的問題曾認真地加以思索和比較，并用親身經歷的偉大事实加以証明，使我对這個問題有了一定的正确認識。所謂親身經歷的偉大事实，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过程。当1954年3月憲法草案初稿提出來以后，憲法起草委员会从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組織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8,000多人，分組討論了兩個多月，修改的地方很多。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把修改后的草案公布，交給全國人民討論。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說：全國参加討論的有1億5千多万人。收到所提意見以后，对草案作了許多修改，才制定成9月9日的最后草案，在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时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又作了討

論，在9月20日正式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們，以為我們在大会上只討論了幾天，一點沒有爭論，更沒有打架，就全體一致地通過了憲法，認為一定是不民主。他們不知道我們是全國人民能參加的都參加了討論。第二個重要的例子是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經過。大家都知道，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是經過幾年的時間和不少專家多次反復研究討論制定的。今年7月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會以後，又分組詳細深入地加以討論。據我所知道的，根據各小組所提的意見，又修改了300多處。最近頒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發表以前也經過各方面的反復研究和廣泛的討論。由於這些事實，使我看見了新中國的人民所享有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實質。這樣的民主自由，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里的人民所絕對不可能享有的。因此，對革命的敵人需要實行專政這一點，也使我有了明確的認識。我們的政府既然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我們國家的真正的主人，如果有人反對這樣的政府，破壞我們的國家，他就是和全國人民為敵，他就是真正犯了罪惡，那還不應該對他實行專政么？

以上所說的是我在解放以前相當長的時期的思想情況，和解放以後6年多以來，在黨的教育和關懷之下，思想轉變的情況。直到最近，我已經明確地認識到共產黨是根據科學的真理，社會發展規律，來領導人民，排除一切障礙，向着全人類永久和平幸福的目標前進的部隊。任何一個決心獻身於真理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爭取加入這樣一個隊伍，盡他應盡的力

量。我本着这样的認識，这样的决心，請求学校党委会对我的申請加以討論審核。結果，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8 周年紀念日那个好日子，党的支部大会經過討論通过，接受我入了党。

在入党大会上，最使我感动的是党员同志和参加大会的学校領導干部們对我親切的握手和祝賀。从入党的第二天起，我就不断地接到許多人給我拍來的賀电和寄來的賀信。在給我拍賀电、寄賀信的人們当中，有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其中有許多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位 70 多歲的老师，在辛亥革命以前介紹我入同盟会的苏少衡先生，他也由西安給我寄來了賀信。他們一方面祝賀我，給我許多鼓勵，一方面表示要坚决和我走同一的道路——爭取入党。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無限的兴奋和温暖。

我願意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所敬愛的全國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正在其他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致意，因为我相信在他們中間一定有不少是經歷过同我类似的歷史和曾有过同我类似的思想的人。讓我們緊緊地团結在党的周圍，一同進步，一同携起手來，向着共產主义的光明大道邁進吧！

(1955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报”)

我要为实现偉大的共產主义理想貢獻一切

歐陽予倩

我是个極其平凡的戲劇工作者，尽管有追求真理的心，因为受旧文化的習染深而斗争性不强，所以对共產主义一向只是幻想式的向往，沒有能够把整个生命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从斗争中逐步認識真理。

我从事戲劇运动 40 余年（从成年到现在自食其力沒有干过任何其他謀利的事），在最初一个阶段（1907 年—1917 年），我曾經挂起社会教育的招牌与封建势力相周旋；演了京戲之后倾向于藝術至上主义。我也做过种种改良旧戲的嘗試，碰过不少釘子，但沒找到正确的道路，也沒有得到过一点同情的支援；我也曾搞过“爱美剧”运动，参加过上海戲劇协社、南國社，自己也办过剧团，成績很小；寫过不少剧本，比較成功的可以说沒有。我的政治态度最初是反对外國人統治，進而反帝制，反軍閥，反賣國賊，可只是心里想着，口里談着，沒有具体的、鮮明的行动。我对民國初年國民黨一班新貴們的趾高气揚日趨腐化是有反感的；及至孙中山喊出打倒帝國主义的口号，我同情他所提倡的國民革命，也以为他所著的建國大綱是对的。“北伐”以后以为可能有些办法，我便放弃了舞台生活，想投身革命事業。由于蔣介石的極端反动，給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时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才好，就不免產生了感伤的情緒——我既不願搭班子再演些無聊的戲，生活又沒有办法，只好改行干电影，拍了兩部默片，都不滿意，覺得和老板們也不容易合作；以后我便到廣東住了3年，办了个戲劇研究所。那时候，上海正組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翼戲劇家联盟等团体。我自以为是不甘落后的。但那时我的思想相当混乱，从我当时所寫的文章可以看得明白：我对進步的文藝理論並沒有好好学习，只憑自己一点狹隘的知識和見解在那里乱碰。

廣東戲劇研究所解散以后，我回到上海，恰遇“一·二八”事变。此后我的思想有顯著的轉变：当“五·卅”惨案發生的时候，南通張季直寫文章反对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我以为他很不应該，但不懂得他为什么会那样，証之以“一·二八”当时的所見所聞，令我联想起張季直的文章，又不禁想起長沙紳士为着对付共產党請日本兵艦向城里开炮的事，这我才相信階級意識超过民族意識的說法完全正确。我們十九景的活报剧“不要忘了”（寫“一·二八”淞滬之战和李頓調查团）就是那个时期寫的。我开始認識工人階級的品質，我又讀了些中國共產党發表的文件，我便肯定地說：“只有中國共產党能救中國。”但这并不等于說我完全了解中國共產党。

1932年初冬，我到了法國，参加过四、五次法國共產党所組織的工人晚会；1933年春到过英國；同年夏天到秋天到过苏联兩次；同年冬回國，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失敗后走日本。1934年秋回到上海从事电影編導。这一时期我明确地認識到沒有中間路綫可走。

中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一般地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黨的領導和影響，我當然也不能例外。1934年我回到上海後，比較以前和黨接近了一些，抗日戰爭爆發後便更加接近黨，以至和地下黨員共同進行革命活動。我雖然知道些社會科學的名詞，但並不會好好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解放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固然有困難，而自己也沒有下決心去鑽研），因而不懂得黨的政策，不具體明了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知道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自己的立場也不是站在工人階級方面，而始終是站在小資產階級方面，以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情無產階級、願為革命的勝利盡其所能盡的一分力量也就行了。

從1949年春天到如今已經6年多。在這6年當中，我雖然學習得很不好，但我參加過許多重大的會議；並且在政府機關擔任過一些工作；經過文藝整風、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等運動；還光榮地和黨員同志一同學習過整黨的文件。在許多同志幫助之下，尤其是直接在黨的領導之下，我才真正有了些進步，我明白了首先必須站穩正確的立場，然後思想和行動才能完全一致，而立場和成分是可以改變的。我進一步懂得了些黨的政策；我從多方面認識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也看到了黨對每一個黨員和非黨幹部的教育培養和親切的關懷。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黨怎樣領導人民取得一系列偉大的勝利，把一個被強盜土匪弄得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國家改變成為強盛的國家。体会到黨的偉大理想和達到這一偉大理想的途徑和步驟，這才懂得了

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穩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歷史意义。几年来在工作当中，对統一战綫的道理和如何运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有了一些体会，多多少少克服了自由主义的缺点，决心要做一个忠于祖國和人民、为党的事業而終身奋斗的共產党員。

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塗过了，45歲以后多少有些進步。只有最近的6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經60多歲，还患着难治的關節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國共產党是最偉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業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國有所貢獻。从我40余年的經驗証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組織便可使渺小之軀發揮無限的力量。

当我學習党員八項条件的时候，我曾經把我的一生从头想过一下，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意識濃厚，斗争性不强，这几年虽然有進步、做一个党員也还是不完全够資格。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誠懇的願望，希望党能給予更多的培养，使我在組織生活中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督促，好比一部旧机器在先進的工人运用之下可以多發生点滴的作用。古話說：“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自信也还有些勇气和不懈之志。現在我光荣地被批准入党，我一定要在同志們的帮助和督促之下，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領導下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党的事業——實現偉大的共產主义理想——貢獻一切，希望能起一个小螺絲釘的作用。

(1955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

終身难忘的日子

黃家驊

1955年3月1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光荣地成为一个中國共產党的候补黨員，將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全部貢獻給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

我的家庭出身和長期受美帝國主义文化侵略影响，曾經使我远离人民。几十年來，虽然我沒有參予什么反动政治組織，但一直鑽在“純技術”的圈子里，自鳴清高地以为医学是“超政治”的，对革命斗争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一心一意只为自己做一个有名望的專家和教授而努力。解放战争时期，蔣介石政府貪污腐化成風，物价一日数漲，生活極度困难，我虽然是个大学教授，每日里也要愁米愁鹽，領了薪金要立即到馬路上去調換美鈔、銀元。在这种时候，“不問政治”的我也不能不感到了反动政治所帶給人民的灾难，我厭惡蔣介石政府，盼它快点垮台，可是对共產党还没有認識。

解放后，我参加了政治學習，听了一些政治报告，也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會議，开始接触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名詞。特別在1950年召开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會議上，听到朱德副主席和吳玉章同志的报告，認識了共產党和人民政府对科学工作的关怀和重視，开始了解到自然科学也与

政治有关，懂得了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为自己。

1950年冬天，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我也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去前綫工作，和我們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有了接觸。那時，我具體地看到那些忠心耿耿為了保衛祖國而貢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戰士，看到了那些在重傷昏迷中還忘不了要重返前綫殺敵的英雄。我很感動，也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當我歡送着病愈的戰士們出院歸隊的時候，當我讀着他們從前綫寄來的信，分享着他們勝利的歡樂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工作和保衛祖國、保衛和平的正義行動不可分，我再不以為自己的工作只是“純技術”地替人治療，我懂得了技術必須與政治結合的道理。

從前綫工作回來不久，我就被邀請列席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会上聽了許多報告，使我对新中國各方面的偉大成就有了总的認識，這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勝利之得來不易，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在短短兩年的時間中才獲得了那麼大的成就。在閉會的宴會上，我有幸得和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坐在一桌，聽到他的指示。毛主席領導革命，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使全國人民獲得解放，做了翻天覆地的偉大事業，可是他對我們却是那樣謙和，那樣的親切與關懷，使我們在他面前一點不覺得拘謹。我回顧自己，只要工作中稍微有點成績便沾沾自喜，表現出驕傲自滿情緒，面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我感到真是羞慚無地。第二天，劉少奇同志又給我們做了個報告，談到共產黨員

标准的八項条件。这个报告進一步啓發了我，使我决心除去为个人名利打算的自私观点，爭取做一个光荣的共產黨員，終身為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服务。

从那时起，我就把那張印發的共產黨員标准的八項条件每天帶在身边，經常拿出來对照着要求自己。經過自己一年多的考慮，又經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各項运动和党在各項工作和學習中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我的入党要求更迫切了，在黨員同志的鼓勵和帮助下，我終於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請。

在申請入党之前，我也不是沒有顧慮的。首先，我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高級知識分子，年齡比較大，因而社会关系也比较复雜，过去对党的事業沒有貢獻，現在距离共產黨員标准的八項条件也还差得很远，党会不会考慮我的申請呢？但是，这个顧慮很快就消除了，因为我認為只要我是願意为党的事業服务，要求在党的教育下改造自己，党迟早是会接受我的。如果这次申請沒有獲得批准，也一定会使我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缺点，更明确地認識自我改造的方向，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其次，我想我是一个技術人員，我將以我的技術为國家建設事業服务，加入共產党以后，會議会增多一些，这是否会影响到我技術工作的發展呢？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就不能不把我自己解放前和在解放后的技術工作做一个对比。解放前，我沒有担任任何行政工作，也沒有什么会开，更沒有政治學習，我有全部時間做我的技術工作，可是那时我的医療工作的